

黃宗羲論

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

黄宗羲论

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吴光主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封面题词：张岱年

封面设计：凌瑛如

黄宗羲论

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吴光主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21 插页 4 字数 490000 印数 1—13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8-010-5/B·1

统一书号：2347·2 定 价：4.65 元

编者的话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至二十五日，首次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宁波市举行。会议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浙江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杭州大学、宁波大学、宁波师范学院、余姚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宁波市哲学学会、宁波市历史学会参加联合发起。与会代表一百三十七名，包括美国、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加坡以及香港代表九名。代表们提交了一百零二篇学术论文，另有四名日本学者、一名苏联学者和一名澳大利亚学者，虽未出席会议，但也提交了论文或专著。

这次会议是经过长期酝酿准备，并在整理出版新编《黄宗羲全集》的基础上举行的。一九八三年八月，浙江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成立，即提出了召开全国性的黄宗羲学术讨论会的建议，并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与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宁波市哲学学会联合发起，在宁波举行了由上海、浙江两地学者参加的“黄宗羲与浙东学派学术讨论会”。而浙江古籍出版社在一九八三年成立伊始，即决定出版《黄宗羲全集》（全十二册，四百多万字）新点校本，并委托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负责组织落实，确定由沈善洪院长（兼会长）任主编，由吴光[“]所长（兼副会长）负责全集编目、遗著考辨和点校组织工作，由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部终审发稿。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全集整理点校工作现已基本完成，第一、二册已经出版

（其余各册将在今后两年内出齐）。这既为全面系统地研究黄宗羲的思想与学术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也为本次会议的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由于黄宗羲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外学者对这次国际学术会议十分关注和重视，所提交的论文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学术水平也较高。所探讨的问题不仅涉及黄宗羲的事迹、著作、思想、学术的各个方面，而且涉及到明清两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上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如何看待黄宗羲与王阳明、阳明后学、东林党、浙东学派乃至整个明清学术的关系？如何分析和评价明末清初社会思潮的来龙去脉、历史特征及其影响？如何宏观地把握十七世纪中国与西方的历史特点以及当时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或冲击？等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受会议领导小组和主办单位的委托，从提交会议的一百余篇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一部分，提请作者修改或删节以后，编成本书，交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作为本次会议的一个纪念，也可说是对近年关于黄宗羲思想与学术的研究成果的一个不全面总结吧。

由于本书篇幅限制，有的优秀论文不能全文选入而采取了删节或摘编的形式，有的论文虽有一定价值但却未能入选，这是要请作者和读者鉴谅的。至于入选之作，或在观点上见仁见智，甚至互相反对，那当然不能强求而且也不应该强求统一。我们宁遵“贵一偏之见，存相反之论”的态度，庶望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得到实行。

在编目方面，本书大体分为八类：一、总论六篇；二、哲学思想研究八篇；三、政治思想研究十三篇；四、史学思想及其他八篇；五、事迹与著作考辨六篇；六、研究述评二篇；

七、论文摘编十六篇；八、附录一篇。全书由吴光担任主编和统稿，钱明、董萍参加了审稿工作，然后交由浙江古籍出版社终审出版。另外，沈善洪、王凤贤同志对本书的编排方法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在百忙中亲自为本书题名。我们谨向所有为本书写作、编辑、出版工作出了力的同志表示由衷的谢忱。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于一九八七年元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黄梨洲与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	张岱年(1)
理学与心学的批评的省思——综论黄宗羲	
哲学中的理性思考与真理标准	(美国) 成中英(8)
阳明学的演变与黄宗羲思想的来源	沈善洪 钱 明(46)
黄宗羲思想的历史性格	(日本) 高桥进(74)
试评历代学者论清代浙东学派	王凤贤(88)
黄宗羲与清代学术	吴 光(109)
论黄宗羲心学的定位	(香港) 刘述先(137)
黄宗羲与近代历史主义方法论	冯 契(155)
黄宗羲的真理观片论	萧萐父(159)
黄宗羲心性说述评	楼宇烈(176)
黄宗羲与中国近代思维方式的萌芽	夏乃儒(188)
黄宗羲与王学	杨国荣(200)
黄宗羲理气说的逻辑结构	葛荣晋(213)
《明儒学案》的结构与功能分析	余金华(225)
从中国思想史看黄宗羲的反君权思想	蔡尚思(242)
读《明夷待访录》札记	邱汉生(250)
黄宗羲与时代思潮	郑昌淦(263)
从东林党到黄宗羲	(日本) 小野和子(273)

《明夷待访录》与《明儒学案》的再评价	(美国)司徒琳(287)
《明夷待访录》的先驱——王艮	
“以天下治天下”的思想	(联邦德国)余蓓荷(303)
试析黄宗羲“君害论”与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渊源关系	周继旨(310)
从“源”“流”关系看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的历史地位	李锦全(322)
《破邪论》平议	罗 炽(330)
李滋然《明夷待访录纠谬》初探	(新加坡)李焯然(338)
黄宗羲肯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	南炳文(350)
论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思想	李朋友 梁玉九(358)
黄宗羲的华夷之辨和他的学人生涯	庄 严(365)
黄宗羲的思想结构和思想方法探索	白砥民(377)
黄宗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裘克安(386)
黄宗羲的史学贡献	仓修良(392)
黄宗羲与《明史》	汤 纲(404)
梨洲文论初识	毛佩琦(414)
黄宗羲科学思想论略	周翰光(427)
黄宗羲与方以智	蒋国保(439)
黄宗羲与吕留良	(澳大利亚)费思堂(451)
《明儒学案》考辨	(日本)山井湧(473)
黄宗羲《留书》评述	洪 波(489)
黄宗羲与文昌社	方祖猷(496)
《黄梨洲先生年谱》考辨	王政尧(505)
竹桥黄氏述略	叶树望(512)

日本的黄宗羲研究概况

(日本)佐野公治(522)

黄宗羲研究三十年

邬满君(537)

论 文 摘 编

- | | |
|-------------------------------|--------------|
| 试论《明儒学案》 | 陈正夫(552) |
| 略论《明儒学案》学术风格的新特点 | 卢钟锋(557) |
| 试论黄宗羲《明儒学案》 | 朱仲玉(564) |
| 十七世纪中国向往民主政治的纲领
——读《明夷待访录》 | 胡国枢(570) |
| 儒家理想人格的分裂及其对君臣关系的反省 | 李存山(576) |
| 论黄宗羲创造性研究的特点 | 徐苏铭(583) |
| 黄宗羲哲学与王学 | 夏瑰琦(588) |
| 黄宗羲与刘宗周思想异同的比较 | 朱义禄(593) |
| 黄宗羲与魏源 | 李汉武(599) |
| 黄宗羲教育思想简述 | 陈增辉(604) |
| 黄宗羲人才“八法”述评 | 王维和(610) |
| 《明夷待访录》的经济思想述评 | 方同义(617) |
| 黄宗羲无神论思想的时代特色 | 江汎清(621) |
| 黄宗羲别号考 | 季 续(625) |
| 黄宗羲故居考 | 邵九华(630) |
| 黄竹浦略考 | 徐仲力 诸焕灿(635) |
| 黄宗羲研究主要论著索引 | 翟岩辑(639) |

黃梨洲与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

北京大学 张岱年

恩格斯讲过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好几位文化巨人。中国的明清之际虽然跟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不一样，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出现了许多文化巨人，其中一个最伟大的就是黃梨洲先生。我们现在来讨论黃宗羲的学术思想，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在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文化热，我认为是好事情。今天我就来结合文化问题，谈谈黃梨洲的思想。

五四文化运动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口号，一是科学，一是民主。虽然过了几十年，这两个口号却还是需要提的，还是重要的。二十年代时许多人曾经认为，中国没有科学。可是这几年来，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写了一部很大的书，叫做《中国的科技与文化》，他证明了中国过去有科学。我觉得这个结论很重要。现在还有个问题，即中国过去是不是也有民主，这个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我认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在中国思想史上，讲民主讲得有典型意义的，要算是黃梨洲了。黃梨洲的民主思想在思想史上是比较鲜明的。我这里只谈三个问题。

第一，黃梨洲民主思想的渊源。我认为，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已有民主思想的萌芽，可说是有两个重要代表吧，一个是孟子，一个是庄子。黃梨洲主要是受了孟子的影响。在孟子以前的春秋时期，有件著名的事，叫做“子产不毁乡校”。《左

传》记载，郑国有个乡校，许多人到乡校去议论执政者。有一个人就对子产说，他们这样议论、批评你，这不好，应该毁掉乡校。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乡校呢？别人给我提点意见，他的意见正确我就采纳，不正确也没有关系，这是我的老师呀，我为什么要毁掉乡校呢？那个提意见的很佩服，说，你实在是高明啊。后来孔子也评论说，子产真是个仁人哪。子产不毁乡校就是愿意接受群众的意见。子产可说有点民主风度吧。孟子则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为什么说“民为贵”呢？过去人们总是要贬低孟子这句话，我认为这“民为贵”是非常重要的话，孟子认为国君是可以改变的，君主不好就可以换一换。社稷是指当时国家的庙宇、祭坛。孟子认为社稷如果不怎么样，也可以换一换。国家里有一样是不能换的，这就是人民。你不可能把国家里的人民不要了，再换一批。所以孟子讲“民为贵”，这可以说是民本思想。孟子还有一段话也可说是比较明显地表现了民主思想。他对齐宣王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梁惠王下》）又说：“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同上）孟子这句话过去都未被重视，但非常重要，可以叫做国人的民主，即什么事情都听从国人的意见。国人不包括奴隶，可以说是平民，至少是城市里的平民吧。他这种国人民主，是一种民主。古希腊不是讲奴隶主的民主么？所以孟子讲的民主还是比较鲜明的民主观念。这些思想都影响到黄宗羲。黄宗羲是比较景仰孟子的，在孟子之后跟黄宗羲思想比较密切的是宋元之际的思想家邓牧。邓牧在宋亡之后，写了《伯牙琴》。其中有两篇文章，一叫《君道》，一叫《吏道》，反对和批判秦始皇以后的封建专制

主义，赞扬尧舜时的情景。尧舜时是其分未严，其位未尊，统治者跟人民的区别并不严格，他们的地位也并不很尊严，邓牧认为这种情况是好的。到秦始皇以后，位越来越尊，分别越来越严，这就很不好。他提出一个办法，认为最好是把官吏都去掉，让人民自主。他的话很抽象，可以说是抽象的民主思想。他这思想影响到黄宗羲。所以我认为黄宗羲思想的渊源是孟子，也受邓牧的影响，中国的民主思想至少可以说有这么几个代表人物吧。当然，明清之际反对专制主义的也不只黄宗羲一个人，也还有唐甄以及许多思想家，都对专制主义提出了批评。这都是进步的思想。

第二，黄梨洲民主思想的特点。黄梨洲民主思想的特点有三：一，他对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他提出主客问题：到底是谁为主，谁为客？他认为上古时代，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到秦始皇以后是君为主，天下为客了，主、客关系改变了。我们现在了解的民主思想意义也很复杂，其中包含许多的层次和问题。至少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谁服务的问题，就是统治者与人民谁为谁服务；一个是最终权力问题，就是最高权力应该由谁掌握。民主思想也至少包含这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官吏或执政者应该为人民服务，其次就是最高权力应该属于人民。黄梨洲提出主客问题，就是要以人民为重，这可以说是比较明显的民主思想。他所谓的为主，主要是讲谁服务的问题，不是讲最高权力的问题。他说古代以天下为主，是说古代的执政者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兴利除害、替人民办事情的。所以他讲这个君民的主客关系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很有价值的。其次是君臣关系，他认为臣不是为君服务，而是君和臣都应该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新思想。唐朝韩愈曾做过一篇《原道》，他也讲君、臣、民的关系，认为君主是发布命令

的，臣是为君服务的，人民也是为君服务的。黄梨洲的思想与韩昌黎的思想正相反。二，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是非决于学校”。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这由谁来决定呢？他认为，在中国从秦汉到明清，都是说要由天子来决定，他认为这不行，因为天子不一定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常常会犯错误。他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这话非常重要。我在过去讲中国哲学史也没着重这一条，认为这是黄梨洲的初步的议会思想，这种解释没有理解黄梨洲的思想的深刻意义。我现在是这么看的，即黄梨洲提出了政治跟学术的关系问题，是应该由政治来指导学术呢？还是应该由学术来指导政治？黄梨洲认为应该由学术来指导政治，不应该由政治来指导学术。我认为他这一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从西方思想史来看，应该说学术确实在历史上起了指导政治的作用。比方说英国，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那么它的思想是受谁的影响呢？是受洛克的影响。法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它的思想则来自于卢梭和伏尔泰。马克思、恩格斯是领导世界革命的，但他们并没有掌握政权。他们是作为一个学者来领导世界革命的。这也可以说马克思作为一个革命家同时也作为一个学者，他研究了许多理论问题，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学术和理论问题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时代应该接受其指导。当然，学术指导政治事实上也很难做到，可是历史上还是有这种情况，像马克思，就起了这么大的作用。这不是很明显么？三，黄梨洲还有一个重要思想，我自己过去也没有很好地重视，就是学术自由的观点。黄梨洲的著作很多，《明儒学案》是他的精心的著作之一，其中的《自序》和《凡例》所表现了一个思想，我认为

他是在主张学术自由。他在《自序》中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叫做“殊途百虑之学”。这一点过去我也没有很好重视。近来我看《自序》，觉得这非常重要。他说他的老朋友恽仲升，跟他讲他们老师刘蕺山的学术，恽仲升对“殊途百虑之学”不理解，而黄梨洲是主张“殊途百虑之学”的。这句话出自《易传》，其中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黄梨洲在《自序》中说：“古之君子……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过去学问都讲殊途，为什么现在的学者都讲出于一途呢？他在《凡例》中又说：“学问之道，以各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我认为黄梨洲这段话非常重要。每一家，他只要是成为一家之言，都有他的一个宗旨，我们就要了解他这个宗旨。各人的学说不一样，宗旨就也不一样，是否是一偏之见或相反之论，这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有自己的真正见解，就应该重视。这就是“殊途百虑之学”。当然黄梨洲也重视所谓同归一致，认为孟子是最高的典范。他说的“殊途百虑”之学就是讲学术自由，就是提倡百家争鸣，反对照样画葫芦。我认为这是真正理解了《易传》那句话。我们现在大家都应该拥护社会主义原则，但又可以百家争鸣，对具体问题有各人的见解。在历史上首先强调这一点的就是黄梨洲，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第三，中西民主思想的比较。过去人们完全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民主思想，我则认为中国过去也有民主思想。可能有些人不同意，我还是这么个看法，提出来讨论吧。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民主思想与西方的民主思想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相同之处？这相同之处还是比较明显的。民主需要有这么一个

根本观点，就是把人看成人，就是要承认别人也是人，尊重别人的意见。中国古代孔子讲“仁”，就是把人看成人，西方讲人道主义，也是把人看成人。我觉得这点还是有相通之处。不过，中国民主思想跟西方近代那些启蒙思想家所讲的民主还是有很大差距，黄梨洲虽有这样伟大的贡献，但也还是有很大差距，这点我们要承认。那么，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它们的理论基础有所不同。西方，尤其是近代，他们的理论基础是人权观念，天赋人权，也可以翻译为自然权利，即承认每一个人生来都有他的权利。这不是别人给他的，而是他自己具备的，任何人都一样。西方天赋人权是资产阶级学者提出来的，所以现在许多人就认为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但事实上我们的宪法也讲人民有一些基本的权利。西方的人权思想可惜是中国传统思想所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呢？儒家也讲“权”，但不是权利之“权”，而是“经、权”之“权”，讲的是变通。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否也有讲权利之“权”呢？有。先秦的法家如慎到、商鞅、韩非都讲权利之权，但他们专门讲的是“君权”，不讲民权，不讲人的权利。先秦法家有其进步之处，即以法治国，但他们看不起人。先秦法家的一部重要著作《管子》，它的思想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它有这么一句话，叫“用人如用六畜”，说用人跟用牛马一样，这是把人看做是牛马。所以来汉朝的扬雄就批评法家申不害和韩非，说“奈何牛马之用人也”，认为申、韩把人看成牛马是根本错误的。我觉得扬雄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儒家则不一样。儒家反对把人看做牛马，这从孔子开始就这样了，所以《论语》上就有个记载，说是“子退朝，厩焚。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就把人跟牛马分开了，这是儒家的一个优点。可是儒家就没有提出人权思想。儒家只讲人对人有义务，不讲每

个人有权利。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是否也有人讲每个人有他的权利呢？有。先秦儒家有一派叫漆雕氏之儒，曾有过这种思想，可是没有居正统地位。儒家没有强调每个人的权利，这点是遗憾之处。儒家如孟子、黄梨洲讲民主，有一个理论基础，即孟子提出来的“良贵”观念。他说：“人人有贵于良者”，这叫做“良贵”，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本然的价值”。人人都有他生来的价值，只要每个人认识和发挥了这个价值，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人。所以他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达到圣人的境界。孟子还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舜是人，我也是人，我若有所作为，我也可以像舜那样。我认为孟子所讲的民主，是承认每个人有天赋价值，跟天赋人权有所区别。他主要是从道德方面来讲的，西方则主要是从政治方面来讲的，这是一个根本区别。从这方面看，儒家是要求重视个人的尊严，这是中国传统中一个极宝贵的思想。儒家在这方面讲的特别多。孔子就曾赞美过伯夷、叔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后来士大夫知识分子就有这么一个传统，讲“士可杀，不可辱”。不过我认为这句话太消极了，应该是士不可辱，也不可杀，要为正义而斗争。可见，中国过去也有民主观念，可是这民主观念不太完全，不讲人民的基本权利。

黄梨洲是中国过去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的代表，他强调人的尊严，强调每个人在道德上都可以达到最高水平，这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学习西方的科学，参考西方的民主，健全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们现在纪念黄梨洲，就要发扬他的民主观念，这与学习西方民主并不矛盾。（根据讲话录音整理）

理学与心学的批评的省思

——综论黄宗羲哲学中的理性思考与真理标准

美国夏威夷大学 成中英

甲、绪论——宗羲学术的启示

黄宗羲以史学著称，其所著《明儒学案》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之始。梁启超谓黄宗羲、万斯同一家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见《清代学术概论》）。但此一说法把黄宗羲定位在史学范围，对其所以为史学以及如何为史学的理性思考过程及真理判断标准却撇除不论了，因此也对黄宗羲史学精神之所在毫无交代。如果吾人仔细和深入考察黄宗羲的生平与著述，当不难发现，宗羲之史学实发轫于理学与心学，因其理学与心学而致力于史学，故其史学可说为其理学与心学之用。事实上，基于六百年来理学与心学的背景，也基于他师承心学大儒刘宗周的渊源，理学与心学乃不得不成为他用心之所在。因理学与心学的用心而致力于时代巨变的启示，再推引于学术史的研究，这才是他学术思想发展的真正轨迹。宗羲这一学术思想发展轨迹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显示了理学与心学面临到非变不可的情势，也发展到了非变不可的阶段。这一转变亦可说是理学与心学接受历史考验的结果，因此转变亦为理学与心